

公共管理译丛

新政府沟通

—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沟通

MPA

**A VIRTUOUS CIRCLE-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美] 皮帕·诺里斯 著
顾建光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MPA 译丛

新政府沟通

——后工业社会的
政治沟通

**A Virtuous Circle—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美]皮帕·诺里斯 著

顾建光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公民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公民参加竞选投票的比例低,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西方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与新的媒体和政党所采取的政治传播和沟通过程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本书作者对于这种传统的观点持不同的意见。作者在书中对后工业社会的新闻媒体和政党的作用做了比较研究,核心的研究结论是,与其错误地把注意力都放在对新闻媒体报道方式的鞭挞上,不如去了解 and 面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内在的更加深层次的毛病。作者认为,尽管新闻媒体的一些负面报道可能会对公众对于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的支持造成不良倾向,但在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与他们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治参与之间还是存在着连贯而积极正面的关系。本书适合公共管理专业学生以及教师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政府沟通: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沟通 / (美)诺里斯著;顾建光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13-03657-4

I. 新... II. ①诺... ②顾... III. 国家-行政管理-研究-美国 IV. D7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588 号

新 政 府 沟 通

——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沟通

[美]皮帕·诺里斯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75 字数:220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50

ISBN 7-313-03657-4/D·103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如何提高公共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已经日益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心。这不仅在于,随着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所面临的需要应对处理的公共事务、社会问题日益丰富、繁复和多样化,公共管理能力还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从全球的角度看,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各国兴起了一场推动公共管理变革的运动。这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战略是寻求降低政府的成本,使政府对于公民、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变得更加友好,提高公共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以及提高政府的生产力。这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努力,总的来说,就是要让政府工作得更好,成本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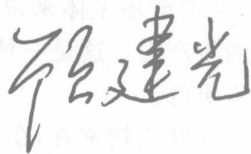
实践之树常青,在当代的公共管理领域尤为如此。的确,没有一个政府,也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改进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是一项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工作,必须不间断地继续下去。各国的政府、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管理者,总是需要按照人民的需要来采取新的业绩标尺改进工作。不思改进和既得利益的权力永远是可畏的障碍。改革永无终了这一事实,一直是管理的改革战略和战术的最为重要的教训。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各国在公共管理方面的任何进步和成功的经验,都会很快地为地球每个角落的人们借鉴和吸收,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向新兴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型)。我国政府和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自身国情,努力探索、开拓,在公共管理实践方面形成了绝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丰富经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正成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如何提高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的效率和能力正是进入 21 世纪的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义不容辞的紧迫使命。

总之,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在推进政府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提升公共管理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当然其中也不免一些不足与教训。理论界对此也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做了总结和提炼,发表了不少富有见地的学术成果,著述颇丰,十分值得我们很好地在这方面认真予以借鉴、消化和吸取,以利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的更好发展。

我国自 1999 年以来开展 MPA 专业学位教育,对于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将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也有赖于国际的借鉴与互动。这套丛书在这方面将发挥重要助益。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积极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几年以前就开始先是投入精力仔细选取国际上的经典之作,继而组织力量翻译。这套译丛选取的均是当代颇具影响的学术代表之作,其中的不同著述能够从各自的不同侧面反映当代国际上公共管理实践和理论的新进展。来自理论界和公共管理实践界的读者同仁们或可从中受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的编辑们均以十分认真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投入,值得称道,没有他(她)们的辛劳也就不会有这样一套富有价值的译丛顺利出版,在此尤为应该替他(她)们书上一笔,以致谢意。



2004 年 9 月于上海交通大学

译者序

近数十年来,世界上不同社会中的政治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都由于新的通讯技术和手段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型。这些新的技术和手段也对原先看来不同的东西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挑战。诸如新闻、信息、娱乐和广告之间的界限开始被打破;随着万维网的到来,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突破;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界限也在淡化。这样就形成了新的传播系统。因此,从国家的层面上、比较的层面上和全球的层面上来对现代传播沟通、社会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成为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

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公民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公民参加竞选投票的比例低,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原因何在?套用书中的术语来说,这是否是一种“公民疑症”(一种原因不明的不健康状态)。西方的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这与新的媒体和政党所采取的政治传播和沟通过程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络等)上充斥着花边新闻、小道消息、娱乐新闻乃至黄色内容等,均是为了取悦于个别读者,争取受众的市场份额。从政治上说,政客们在媒体上的做秀、媒体对政治领导人的私生活和政府腐败的不断的负面报道等,这些被作者称为“媒体疑症”(即媒体所犯的病因不明的不健康状态。)

但是,本书对于这种传统的观点持不同的意见。本书的论证也就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作者在本书中对后工业社会的新闻媒体和政党的作用做了比较研究,尤其是集中关注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情况。核心的研究结论是,与其错误地把注意力都放在对新闻媒体报道方式的鞭挞上头,不如去了解 and 面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内在的更加深层次的毛病。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对新闻媒体的绩效进行比较的合适标准,并对各国新闻媒体所面临的挑战加以比较。最后分析了诸如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后现代竞争的发展的蕴涵意义。作者在书中表明,尽管新闻媒体的一些负面新闻报道可能会对公众对于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的支持造成不良倾向,一般来说,在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与他们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治参与之间还是存在着连贯而积极正面的关系。书名“良性的循环”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作者皮帕·诺里斯是美国哈佛大学“肖伦斯坦新闻、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兼职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

比较政治沟通、竞选以及性别政治学等。她的新作包括：《竞选中的沟通》、《批判性的选举：从长期角度来看选民与政党》、《批判的公民：对民主政府的全球支持》。作者在比较政治行为的领域发表了上百篇的论文，还是《竞选研究》、《欧洲政治研究杂志》和《政治沟通》等多种期刊的编委。

此书讨论的主题对于我国的读者来说可能是较新的领域。著述观点精辟新颖、视野开阔，取材引据十分广泛，2000年的版本，应该是很具有阅读价值和借鉴意义的。

译者在繁忙科研教学之余，伏案译作，终于将此书及时译完，以飨读者。在翻译的进程中，我们公共管理系的吕晓俊博士帮助我译出了本书第2、3、4、9、10章的草稿，在此特作注明。在本书联系版权、安排出版和编辑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管新潮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译者：顾建光 于上海交通大学

2004年2月8日

前 言

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对媒体疑症的理论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政治沟通会造成公民不参与这样的信念在记者和学者中间已经变得如此盛行,以至媒体评论家们不断重复着一种悲观主义的论调。因此,像这样的对于本书的挑战,使我必须就有关现象发表一些新的看法。无论有关的问题来自校园枪击,来自世界贫穷现象,还是来自对于国会的犬儒主义态度,媒体的这个或者那个分支的确需要受到批评。记者们很乐于做自我的鞭答。政治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而言之,既然新闻是自由的,而我们又对之无能为力,为何不可以对媒体加以批评呢?这是一种完全无害的战略。但是,当累积起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证明情况与流行的期望相反时,我愈益感到需对传统的智慧持一种怀疑和疑惑的态度了。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文献太容易从对于新闻产业(这正在出现)变化的讨论转到这些变化对公众舆论的假定作用(这还没有出现)上去。在探寻支持或者反驳这种论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一些途径从一开始似乎就意味着最终将证明这种论题是错误的。由于任何研究都必须依赖现存的证据,而可以获得的证据又是有限的。在本书所提供的指标中没有哪一个可以被认为是确定的。但是,在本书各章中我们采用了来自不同年份、不同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大量的调查,从而积累起颇有分量的证据表明,那种标准的关于政治传播对于公众影响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新闻界通常被推崇为有助于维系民主的火炬,是处于腐败的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种自由力量,是无辜民众的保护者。但是,当我们发现新闻界的墨客和代笔者为了一个便士而出卖他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不禁被震动了,震撼了。对新闻产业持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让新闻界对世界上的罪恶只是负有较为有限的责任,这样可能对我们来说都不无益处。

假如没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肖伦斯坦新闻、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同事们的鼓励,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特别需要感谢的是该中心主任M·卡尔伯先生,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不断的鼓励和支持。许多同事对本书的早期书稿提供了反馈和批评,这对我都是一种帮助。对布尔、T·科克、I·科雷维、W·董斯巴赫、M·弗兰克林、D·格拉波、A·格林伯格、C·H·巴克、E·霍尔维、帕克、T·帕特森、S·法尔、R·普特南、F·沙尔以及H·赛穆克等,都需要致以特别的谢意,他们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倾听了我的思想,阅读了我的论证。

在此项研究中所提出的理念是经历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多年磨炼形成的。本

书使用了其他出版物的大量数据资料,对此我谨表谢意。我最要感谢的是欧洲委员会的公共舆论部门,特别要感谢 A·梅里奇和 A·赫伯特,他们让我阅读了“欧洲媒体监测”的分析内容以及“欧洲预测调查”的有价值的系列刊物。科恩大学档案馆、密西根大学信息中心、哈佛大学数据档案馆都帮助我获得了堆积如山的数据资料。1994 年“欧洲预测 41.1”的研究工作是与 M·弗兰克林、威瑟尔斯、M·马歇以及其他一起组成的“1994 年欧洲大选研究”课题组一块进行的。在我对 1995 年、1996 年和 1998 年上网者的调查中,得到了“皮尤人民和媒体研究中心”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的一些新思想最初来自对在 1997 年英国大选中新闻媒体作用的研究。这些思想一开始是由 J·考提斯、D·桑德斯、M·斯坎梅尔以及 H·塞梅库发展起来的。1997 年“英国大选研究小组”(BES)得到了“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SRC)的资助。“英国大选研究小组”是由 J·考提斯、A·赫斯、R·乔维尔、A·帕克、K·汤姆逊、G·尹文斯、B·泰勒和其他与“大选和社会潮流研究中心”(CREST)相关的人发起成立的。“大选和社会潮流研究中心”是一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SRC)的研究中心。它与牛津大学“纳费尔德”学院的“社区规划研究”中心有联系。关于政治信任和对政府支持以及对国际互联网的较早研究发现得到了“治理的不同方式”研究项目的启发。这个项目是由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J·奈和 E·卡马克领导的。

关于这个项目及其相关出版物、课程和数据的详细情况可以在 www.pip-panorris.com 网站上找到。

最后,我要感谢评论员 A·霍兹曼、L·巴特曼和 L·本尼特,他们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感谢 R·英特曼先生,他帮助我编辑出版了本书。

作者于
哈佛大学,剑桥

2000 年 5 月

第一部分 新闻媒体与公民不满	1
第一章 新闻媒体与民主	3
第二章 媒体绩效评估	16
第三章 理解政治沟通	24
第二部分 政治沟通的潮流	41
第四章 报纸衰落了吗?	43
第五章 电视时代在崛起,抑或衰落?	62
第六章 新兴的国际互联网时代	86
第七章 竞选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	100
第八章 后现代竞选活动的兴盛	118
第三部分 对于民主的影响	131
第九章 消极的媒体,消极的公众?	133
第十章 无知? 信息与选择	150
第十一章 不太关心? 犬儒的媒体? 犬儒的公众?	167
第十二章 呆在家里? 政治动员	184
第十三章 美国例外论?	204
结论	227
第十四章 一种良性循环?	229

第一部分

新闻媒体与公民不满

第一章 新闻媒体与民主

近些年来,在民主制度的理想与实际现状之间的张力一直在增加。尽管还没有出现“民主的危机”,许多人还是认为,国家政治的情况并不怎么好。在美国,人们所关注的是广泛传播的对于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犬儒主义以及日益增长的公民不参与和半空的投票箱。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公众退出了政治活动,只是呆在家里,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政治事务。欧洲人也有相似的担忧,特别是在跨国家领域里发生的类似情况。随着欧盟权力和范围的逐步扩张,尽管公众不参与关键的政策选择,评论家们还是提到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欧洲选民参加大选的人数迅速递减。这一数字自 20 年前的 3/4 下降到了 1999 年的不足 1/2。如先前的一项研究所探讨的,公民们对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其中包括政府绩效失灵、文化价值的改变以及制度有效性的问题等。

有一种共同的解释涉及政治信息沟通的发展。在过去的 10 年里,大西洋两岸对新闻媒体的批评声如潮水一般,认为是这些媒体造成了公众的不参与、对公共事务的一无所知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观点在流行文学中得以发展,成为确凿无疑的正统理论,尤其是在美国。一种相关的观点在欧洲更为盛行,涉及政党专业政治营销日益昌盛的问题。这也造成了更多的公众的犬儒主义。

但是,这些传统的智慧是否正确呢?本书基于对后工业化社会中政治沟通过程作用的系统考察,坚持认为,由新闻媒体和政党进行的政治沟通过程并不应该对公众的不满意负责。与其错误地“责怪送信人”,不如去理解和面对代表制政府体制中的更深层次上的根基性缺陷。

对政治沟通的传统批评

现在,关于“媒体疑症”或者“电视疑症”的说法十分流行,对于这种现象的各种说明也很多。先让我们对这类通俗的说明做一简要地勾勒,然后再来考察本书中建立的另外的可加选择的视野。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科学作品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后来 70 年代后期“水门事件”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到发展。并且,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大量图书的涌现,逐渐演变成为通俗的记者文化和政治学的传统智慧。其中以美国的批评声最响,但也有来自欧洲类似附和声。不过,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权威的说法。

在本书中，“媒体疑症”指的是这样的说明，它宣称，经由新闻媒体和政党竞选的政治沟通的常规做法阻碍了“公民参与”。我们这儿的“公民参与”指的是：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对政府表示信任以及政治行动主义。我们认为，根据定义，所有这类理论都有两个核心假定：(1)政治沟通活动的过程对公民具有重大影响；(2)这一影响正在起着消极作用。

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理由所给出的解释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有一个学派指责了新闻界的某些倾向。《结构展望》这家杂志强调了许多后工业化社会制度发展的共同性，比如，在经济的压力下走向市场的新闻产业，公共服务中的腐败现象被公诸于世，更加分化的多频道电视环境的出现等。《文化的解释》这家刊物则着重讨论了例如自越战以及水门事件以来明显增多的更具负面态度的新闻文化。另外一些人则批评政治，如《竞选说明》刊物聚焦日益增长的政治营销活动。参与政治营销的包括“诊治专家”、“广告顾问”和“民意调查者”等。这些人减少了在公民和其代表之间的个人联系。最早的理论家们只是提出一些比较有限的主张，主要关注的是电视新闻方面的一些普通实践。后来，这方面的观点被广泛扩展，以至于开始指责为各类新闻业所共有的新闻文化。但是，其他人则是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关注大众媒体的社会影响。这儿的大众媒体包括，从好莱坞电影、电视娱乐片、广告一直到摇滚乐，这些都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以内。

所以，围绕着这样一个角度，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解释。撇开所有这些重要的差异，按照定义，所有关于媒体疑症的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就是，公众不参与政治过程至少从部分意义上说均是出于政治沟通过程造成的。

这些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在整个 19 世纪，人们所表达的批评也都是说，由于报纸变得日益普及，通俗的新闻报道带来了道德的衰落。19 世纪 90 年代的“黄色杂志”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新闻界可能造成公共事务危险的担心。到 20 世纪的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最早的大规模宣传的理论基于以下假定：独裁政权可以通过控制广播、公告和新闻短片来欺骗和误导民众。近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多方面的正义运动反对假设的大众媒体的有害影响，其中或者是针对电影暴力，或者是针对电视的“荒漠”，或者是针对公众观看电视娱乐节目而带来的对于公民参与的影响，或者是针对烟草广告的危害，或者是针对流行音乐所带来的所谓的负面影响。尽管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有什么新鲜的思想，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于，一种毋庸置疑的正统观念被发展成为一场关于政治沟通对公共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大合唱。

关于媒体疑症的美国文献

有关媒体疑症的现代观念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科学文献中。库特

(Kurt)和G·兰格(Gladys Lang)首先提出,在网络新闻的崛起与更广泛不关心美国政治的感觉之间有着相关性。他们认为,电视传播加剧了公众的犬儒主义。因为它过分强调政治冲突,忽视了华盛顿日常的政策制订。他们还认为,这种过程对那些“无心的观众”影响最深,由于他们是刚好打开电视看到新闻而接触到政治的,而他们又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事先的了解。兰格在当时是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在政治传播方面的一致观点是,大众媒体只是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十分有限的作用。

这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得以流传,因为看起来它为在越战和水门时代以后公众的日益异化提供了看似有理的理由。M·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首先使“电视疑症”概念通俗化。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在人们对于美国电视新闻的依赖与对政治犬儒主义、社会怀疑论、政治低效现象的感受之间的联系。他指出,带有高度怀疑主义、冲突情绪和反公共机构意味的主题在电视新闻中频频曝光,造成了政治背叛、受挫和犬儒主义、自我怀疑和不安。鲁宾逊把这一过程看作竞选运动中的最关键之处。他认为,电视节目总是关注于如同“赛马”一样的竞选活动中的辩论、分析,而不是提供真实的信息,或许这些真实的东西对候选人来说是多余的“坏新闻”吧。于是,观众就会将电视机关了。这些年来,有不少人回应了这种说法。S·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他给“三边委员会”所作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报告中指出,新闻媒体侵蚀了许多后工业化社会中对政府权威的尊重,导致了在华盛顿、巴黎、东京等地的街头随处可见广泛存在的“民主危机”。还有一些论证,这一问题的根子与其说是在电视新闻,不如说更多地在于主流的娱乐倾向。在吉伯纳(Gerbner)看来,关于暴力犯罪和城市冲突的电视剧造成了恐惧、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早期,A·兰内(Austin Ranney)认为,电视虽不是导致公众不参与的唯一原因,却也是主要的原因。兰内认为,电视加强了普通美国人对政治和政客的蔑视态度,造成了对政府和公共机构信任和信心的下降,并且促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选举。而这些都导致了文化的改变。

到了20世纪90年代,来自新闻界内部和外部的对于新闻媒体的指责积少成多,终于造成泛滥成灾的大众批评。当时,有关政治领导和政府制度的犬儒主义广泛传播,还有对媒体作用的严重指责。这反映了一种对民主存活力的新的忧虑情绪。在英特曼(Entman)看来,自由的新闻界太缺乏理想,它们使太多的美国公众对政治因缺乏接触而一无所知。N·波斯特曼(Neil Postman)认为,主要的新闻网受有线电视用户的驱动,已经用娱乐导向、犯罪导向、明星导向以及消费者导向的轰动式报道的电视节目替代了严肃的关于国内外事务的政治报道。结果是漫无止境的对好莱坞电影、健康节奏、体育节目的报道,却没有去报道美国正面临

的问题,以至于使我们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在R·哈特(Roderick Hart)看来,电视诱惑了现代的选举人,使之对政治参与和信息形成一种错觉,同时鼓励了“沙发土豆”的被动性,由此将美国人引入歧途。N·加布勒(Neal Gabler)认同了这些观点,他指出,随着政治过程被重新包装成为作秀的过程,娱乐性就成了电视新闻最主要的标准。在一个娱乐至上、明星导向的社会里,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什么能抓住并保持公众的注意力。因而,严肃的政治争论、严峻的政治问题和庄重的选举过程都得靠边站了。

L·萨巴托(Larry Sabato)对全体新闻界提出危险警告:所有的媒体公司都着迷于少数能引起轰动的故事(如戴安娜王妃、莱温斯基),热衷于制造“公众狂热”。T·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认为,作为选举的“监护人”,媒体已经成了“不称职”的机构,在政治系统中运行失常了。他指出,主要原因在于越战、水门事件后美国新闻工作中的逆反文化,再加上解释性新闻的增加。因此,他同意鲁宾逊和西汉(Sheehan)的观点,认为,今天所有新闻媒体对竞选的报道过度集中关注有民意测验推动的“马赛”(谁领先了,谁落后了)、关注冲突性的和消极的新闻(坏的新闻)、关注战略性的游戏框架(有关表面现象背后的“内幕独家报道”)。由于文化的转变,他相信,对美国新闻界而言,常规竞选的新闻报道就是例行公事式的批评政客的立场变化,在重大问题上经常的动摇,一味地迎合公众,做出根本不打算兑现的承诺等。卡珀拉(Cappella)和加米逊(Jamieson)强调,对于政治的战略新闻框架激发了关于竞选政治、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犬儒主义。道特里奇(Dautrich)和哈特里(Hartley)的结论是,新闻媒体“忽略了选举人”,因为很多市民都认为新闻界过于强调运动策略与技巧,新闻覆盖率也有着政治的倾向性,却很少注意到有关政治信息的提供。

J·法罗斯(James Fallows)担心的是,市场化的趋势导致人们不懈地追求感官的、浮表的、通俗的政治报道的网络新闻,以试图在收看者调换频道前争取收视率。舒德逊(Schudson)争辩,这些沉闷的胶片骗局取代了详细、有见地的有关政治问题和真实消息的争论。结果是,尽管美国人拥有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可知信息,但他们仍然不能成为真正有见地的市民。哈奇敦(Hachten)抱怨说,尤其是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已经被娱乐消遣的、哗众取宠的、争名夺利的和商品促销式的混杂物所冲击,因而变得琐碎和腐败。这些都是广告宣传、公共关系(PR)以及公司利润所造成的。许多人指出,由于美国偏离了冷战后复杂的世界共同体,关于国际事务的新闻报道亦已成为受害者之一。随着工业中新技术的出现和经济的重组,商业新闻更加深了市场化的趋势。M·卡尔波(Marvin Kalb)注意到了所谓“新新闻”的出现。在美国,由于长期的投资不足,公共电视的角色已经无法补偿被网络和有线电视持续占领的收视率。许多人因此得出结论,新闻媒体应

受到指责,因为正是它们造成了困扰全国的政治病症,诸如:公众普遍对政府和公共政策无知,参加选举人数的减少以及对政府机构的犬儒主义等。诸如此类的批评已越过高墙传入学术界,许多美国新闻界从业人员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如果用准确、公平、平衡这些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职业,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由T·卢森斯泰尔(Tom Rosenstail)和B·科瓦奇(Bill Kovach)领导的“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已经考虑提出对这一职业的可行的改革方案。

媒体疑症的欧洲文献

在欧洲的相关文献中,虽说不很刺耳,但也有类似的声音存在。那里的描写强调在新闻产业和政党运动中的结构性发展。许多人害怕商业频道增加的竞争会逐渐损害公共服务频道的质量和多样性。剧增的传媒渠道寻求以低成本、低质量的节目捕捉广大的观众,这必将减少节目种类的选择。这种发展可能会破坏观众对公共事务的感受力。正如哈贝马斯(Habermas)所说的,诸如达尔格林(Dahlgren)这样的一些电视评论员担心,来自商业频道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会破坏公共服务电视频道的质量和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西欧公共部门经历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同一时期,商业频道的增加也打破了公共传媒服务的垄断,利用国有资源来对电视进行补贴也破坏了其理性。舒尔兹(Schulz)指出,在德国,公共服务传媒正在减少,商业频道正在增加。后者往往强调更加感性的和负面的政治新闻的方面,而这会增加公众犬儒主义。卡瑟(Kaase)担心,这些发展可能会造成观众的分化,因为他们所能得到的政治信息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另外还会加大“知识的鸿沟”。

在出版部门中,有广泛的顾虑认为,日益激烈的争夺读者的竞争加重了传统标准下对新闻的压力,使其具有“小报化”或“信息娱乐化”的趋势。19世纪90年代的“黄色新闻报道”按照惯例突出报道富人和名人们的道德瑕疵和性癖好。报纸对犯罪与丑闻的敏感性并不是新近才有的事情,这为公众提供了在枯燥的政治事务以外的不同选择。可是在今天,我们比过去的年代更多地可以在报纸的第一版上读到有关政府的丑闻——不管这是英国的宫廷丑闻,还是美国的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这类报道必定会削弱那些得以支持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威的信任模式。“小报化”过程看来在欧洲比在美国或日本的新闻界更为严重,诸如《太阳报》这样的报纸领导着这一过程,而每一种这样的报纸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不过,相似的现象在美国地方电视新闻以及“无话不谈,无时不说”的有线新闻节目追求收视率的表现中也很明显。

许多人都希望国际互联网可以避开这些问题。但另有一些人也担心,这种新的媒体会加重政治犬儒主义。戴维斯(Davis)和欧文(Owen)得出的结论是,国际